

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

金 峰

鸦片战争前, 清廷建立了一个与朝贡体制密切相关、涵盖所有贸易对象国且功能齐备的外贸口岸体系。其外贸各口岸多系顺应中外贸易发展规律、具有交通及外贸地理区位等诸多优势, 故能基本满足需要。作者在考察清统治者构建朝贡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口岸体系的基础上, 分析清前期外贸政策的性质及其时代适应性。

关键词 清前期 外贸口岸体系 历史沿革 地理分布

作者金峰, 1971年生, 历史地理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18号, 邮编519087。

对于鸦片战争前开放广州“一口通商”是否系属“闭关锁国”的讨论, 大多集中于清前期外贸政策及中西贸易管理体制等方面, 而较少涉及广州口岸开展外贸的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同时, 对于清前期外贸口岸的研究, 也大多限于一城一地, 较少有从口岸体系角度进行的考察。^① 然详核之下, 鸦片战争前清统治者针对朝贡、互市各国, 开放有诸多执行不同贸易政策、满足不同贸易功能的通商口岸, 从而形成与朝贡体制密切关联的完整口岸体系, 广州口岸虽十分重要, 仅系其中一个环节而已。本文将从探讨清前期外贸口岸体系及其发展沿革和地理分布特征着手, 考察“闭关”话语的合理性乃至清外贸政策性质及其时代适应性。

一、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

《大清会典》称: “凡市易, 各国贡使入境, 其舟车附载货物, 许与内地商民交易, 或就边省售于商行, 或携至京师, 市于馆舍。所过关津皆免其征。若夷商自以货物来内地交易者, 朝鲜于盛京边界中江, 每岁春秋两市, 会宁岁一市, 庆源间岁一市……海外诸国于广东省城, 每夏乘潮至省, 及冬候风归国, 均输税于有司, 与内地商民同。”^② 即清廷准许各朝贡使团随带商队入京师及在入境口岸贸易, 各朝贡、互市国商人各有特定出入境边口并享受不同的外贸待遇。此外, 民商因边贸传统及地理环境条件不同, 其出境贸易税征口岸和出入口隘的设置也各有差别。

^① 滨下武志从区域经济发 展的立场讨论亚洲港口和外贸, 以港口间及港口与腹地间的生产和贸易关系为关注点, 并非以口岸体系为研究对象。[日] 滨下武志著, 高淑娟、孙彬译: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清) 允禩等纂: 《大清会典》卷56《礼部·主客清吏司》, 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一）京师

朝贡国使团随带商队入京师贸易是朝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荷、葡、英等互市国“贡使”到京，清廷亦按朝贡礼制接待且准许贸易。但因各入境口岸均远离京师且京师非丝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产地，往返耗时费力，故各国主要重视在入境口岸的贸易机会，^① 仅俄、朝两国在京贸易规模较大而具实际意义。

朝鲜在顺治元年（1644）即有使团晋京，至顺治十年（1653）贸易渐具规模。^② 明代形成的“八包贸易”制度入清后被沿用并稳定持续至甲午战后。1655年俄国即有使团（商队）到京。^③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1690年即有一个近百人的商队进京。1697年俄沙皇下令组建国家商队并于次年派至北京，至1718年共有10个商队到京。^④ 后因边境纠纷国家商队活动中止，至1724年方始恢复。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家商队每3年进京一次，至1754年共计派出7个商队。^⑤ 此后俄人停止该项贸易而专注于恰克图边贸。^⑥

（二）外商入境口岸

清前期各国商入境均有明确口岸。海禁时福州、厦门和广州、澳门等海口各对琉球等朝贡国及葡、西等国开放，陆路尚有对朝鲜开放的盛京等口岸。开海后海陆口岸各有增加，其具体情况是：

1. 对朝鲜开放的盛京、凤凰城、中江

盛京、凤凰城二市即所谓“团练使后市”和“栅门后市”^⑦ 的形成，与朝贡活动密切相关。清入关前的崇德三年（1638）朝鲜人即已遣使至盛京，但此时朝贡系贡献性质，贸易发展乃在顺治十年（1653）以后。如朝鲜人所言：“后市者，使行之还也，以延卜杂物互市于栅内……其作法之初，自湾府先送空马，迎送卜物而已。逮至甲戌（按：1694年），延卜杂物略定数交……西商辈暗藏银货于杂物中，私结商胡，狼藉交易。”^⑧ 朝鲜使团、贡物须由义州府团练使护送至盛京，因沿途使费较重，团练使获得在盛京一个“八包”贸易额度，又称“沈阳八包”。该项贸易在雍正六年（1728）因“潜商”走私猖獗而为朝方主动罢止。^⑨ 此外，团练使护送贡使时往往多备驮畜货物，至凤凰城时即可贸易，而其从沈阳或

① 参见（清）嵇璜、刘墉等纂：《清朝通典》卷98《边防二》。

② 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66页。

③ 俄人称：“巴伊科夫（专使）……于（1656年）3月3日到达北京。”（〔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按：此时间当为俄历，中方记载俄使到京时间为顺治十二年（1656）。参见（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④ 参见〔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⑤ 参见〔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7—60页。

⑥ 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345、348、349页。

⑦ “栅门”系是指凤凰城东南柳条边边墙栅门，有戍军而无集市，所谓“栅门后市”，实在凤凰城交易。

⑧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70页。

⑨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429页。

由京师返程时,所雇清人车辆不能出栅,亦须再派载畜前来延接,这些载畜自非空载而来,由此形成“栅门后市”,或称“延卜后市”。此项贸易持续至甲午战后。

针对中江市,清廷规定:“若夷商自以货物来内地交易者,朝鲜于盛京边界中江,每岁春秋两市……以礼部通官二人、宁古塔笔贴式、骁骑校各一人监视之,限二十日毕市。”^①即准中朝边民在中江进行每年两次的集市贸易。市分两期,前期为有特定资格的与市人员按官定物价进行贸易的“公市”,后期为商人、边民自由贸易的“后市”。该市也由清初持续至甲午战后。

对于盛京、凤凰城及中江三市贸易,清廷置中江关稽征税收,初由盛京礼部派员监督,后由东边道督征。

2. 对俄罗斯开放的库伦、齐齐哈尔、恰克图

清初俄罗斯势力接近外蒙古及黑龙江流域,与各地边民均有小规模贸易往来。^②17世纪60年代俄国人开辟了由莫斯科至尼布楚的商路后,尼布楚城成为俄国人组织对华贸易的基地,由尼布楚城至京师途中的齐齐哈尔边贸渐兴。俄国人很快注意到“脑温城(即齐齐哈尔)……开设了相当数量的小铺子与俄国人作生意”。^③17世纪90年代后,以色楞格斯克为基地经库伦进京的商路开辟,库伦边贸也日渐繁荣。《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条商路沿线的齐齐哈尔、库伦两城成为实际对俄开放的通商口岸。特别是俄政府禁止私商随赴北京后,库伦私商云集,外贸较北京更兴盛。^④

《恰克图条约》定中俄边贸口岸在祖鲁海图、恰克图,即将深入中国境内的齐齐哈尔、库伦移至两条商路的边境线上,^⑤两城贸易止歇。祖鲁海图外贸未成规模。至1734年,俄方市场“仅仅建造了四个既无围墙又没有屋顶的鱼棚”,1756年索性将边卡迁走。^⑥其额尔古纳河对岸中方的库克多博地方更是只设边卡而未建市场。^⑦在恰克图,两国各沿边界筑城。俄方于1728年建成恰克图城。中方1730年建成“买卖城”。两城一体,间以木栅,双方商人可互至对方境内交易。随着商队贸易止歇,直到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前,中俄贸易主要在恰克图进行。

齐齐哈尔贸易由黑龙江将军主理,库伦贸易初由蒙古土谢图汗监管,^⑧康熙五十九年

① (清)允禩等纂:《大清会典》卷56《礼部·主客清吏司》。

② 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19—20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05页;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页。

③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95页。

④ 参见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87、88、91页。

⑤ 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183页。

⑥ 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228、295页。

⑦ 参见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121页。

⑧ 参见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93、99、75页。

(1720) 清廷令由理藩院委员稽查,^①均未置税关。恰克图贸易则双方明定“均不取税”。^②

3. 对中亚各国开放的喀什噶尔、叶尔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清廷对中亚各国始具直接影响力。各国中仅浩罕系由汗国君主于乾隆二十四年遣使贡表、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③但各国部族势力独立性较强,如安集延、玛尔喀朗或拔达克山等各城或各部的伯克、领主均自主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递表请贡,甚至有商人假朝贡之名行贸易之事。^④

清帝谕令:“回众与布鲁特、安集延、霍罕等部贸易。”^⑤开放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为通商口岸。浩罕地当对华商路枢纽,贸易地位尤重。清人称其人“寄迹回疆,土人皆惟恐其去,去则其地之财货不能流通,而回人大有不便者矣”。^⑥1826年,浩罕参与张格尔叛乱,其与清廷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朝贡关系破裂,贸易亦复中断,至1832年双方议和后方始恢复。其他中亚国家则与清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经贸关系。^⑦理论上清廷仅开放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但“从前诸事废弛,各卡伦任意出入,以致安集延(按:指浩罕各城)盘踞阿克苏以西各城有数千余户”,^⑧反映出中亚商人在南北疆活动较为自由。

清廷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主理对中亚各国的政治、经贸事务,并在叶尔羌等“大城”设有“办事领队大臣”。^⑨外贸税征事务由各城办事大臣负责,其税率对外商较为优惠。^⑩

4. 对南亚各国开放的西藏各城

清初西藏与哲孟雄、巴勒布、布鲁克巴等南亚三国及作木朗等小部落交界,因藏传佛教的影响形成较为独特的文化圈,相互间有着密切的政治、宗教关系,许多物资交流宗教意味浓厚而非商贸关系。^⑪1769年廓尔喀部统一尼泊尔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六年(1791)两次入侵西藏,五十七年(1792)被清军击败后请贡。此后至1855年廓尔喀部再次入侵西藏,双方关系出现变动。

清前期南亚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多限于藏区。^⑫清人称:“惟西通巴勒布及克什米尔缠头番民常川在藏居住,设厘兴贩者最多。”^⑬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之前或之后,清廷均未限制在藏外商的活动范围,即并未划定明确的贸易口岸。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奏请在江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页。

②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391页。

③ (清)穆彰阿等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0《霍罕》,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1页。

④ 参见(清)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7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2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8877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985,乾隆三十二年六月甲寅。

⑥ (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3《外藩列传·安集延》,乾隆四十二年刊本,第5页。

⑦ (清)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77,第8859页。

⑧ (清)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77,第8887页。

⑨ 参见(清)松筠修:《西陲总统事略》,中国书店2010年版,174页上。

⑩ 允禔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3《理藩院·柔远清吏司》,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⑪ 参见佚名:《卫藏通志》卷2《疆域》,浙西村舍刊本,第6、11页。

⑫ 参见[日]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第1编第11章《贸易》,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之112,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76页。

⑬ 佚名:《卫藏通志》卷11《贸易》,第1页。

孜、定日两地稽查外商出入,仅因其当外贸商路孔道,而并非以之为口岸。外商仍可至藏区各城贸迁,如萨伽城中“商贾半系捏泊尔之尼瓦族”,^①位于藏尼商路之上的聂拉木、济咙等城同样多有外商居停。

5. 外商入境各海口

清开海之前琉球、暹罗等朝贡国由海道入贡,其中琉球自福州、暹罗自广州入境,葡、西等国亦可至广州、澳门、厦门贸易。开海后闽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福州、二十四年(1685)于厦门开关征税,粤、江二省在二十四年于广州、上海,浙省于二十五年(1686)在宁波设置海关。^②1757年清廷令由广州一口通商,系针对西方各互市国而言,^③各省海关仍分别对贡使船只开放,且各朝贡国商船仍可至沿海各口贸易。江浙闽三省海关监督初由户部派员充任,后均改为地方督抚兼理,惟粤海关由内务府派监督始终不废。

(三) 民商出境口岸

清初曾有华商随使臣赴朝贸易,顺治十五年(1658)为清廷禁止,^④故此类贸易极为罕见。但民商由陆路出境贸易系属常态,如清初东北边民即可赴朝鲜庆源、会宁二地的定期集市。至滇、桂、粤三省与缅甸、南掌、安南相交,边境绵长,仅广西与安南间即“三关百隘之外,皆有小径可通”,^⑤传统零星边贸十分普遍,南疆回商亦有赴卡外贸易者。^⑥清廷对此均未加限制。^⑦乾隆中期后清廷对边贸管制加强,各地多形成分司税征、稽查及出入境管理等职能的各类口岸。此外,开海后江浙闽粤四省民船出境海口难以计数。

1. 赴朝口岸

清初清人赴会宁、庆源并无口岸限制。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在与庆源相望的图们江北岸筑珲春城,^⑧以之为出境口岸。^⑨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廷明确:“嗣后吉林、宁古塔二处派往朝鲜之人……俱于喀木赫索啰地方……由喀木赫索啰佐领查明放过……回程之日,由喀木赫索啰详查换来官牛等物,详报备查。至庆源交易之珲春库尔喀人等,即于珲春协领处将应遣往之人、所带之物,并换来之货,详报备查。”^⑩即以喀木赫索啰和珲春二地为对会宁、庆源二市贸易的稽查、管理之所,但喀木赫索啰深入境内,非出境口岸,而清人不由珲春而由沿边各路往赴朝鲜的情形仍十分常见。^⑪因贸易额较小,清人往朝鲜贸易并无税征。

① [日]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第1篇第16章《都邑》,第137页。

② 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8页。

③ 一口通商后西班牙假“小吕宋”之名,仍可至福建沿海的厦门、泉州等港。

④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⑥ (清)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77,第8933—8934页。

⑦ 参见(清)昆冈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禁令》,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⑧ (清)穆彰阿等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8《吉林二》,第25页上。

⑨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330页。

⑩ (清)昆冈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1,《礼部·朝贡·禁令》。

⑪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793页。

2. 赴安南口岸

清前期安南郑黎政权与清廷保持朝贡关系,越南南部的广南政权也同中国保持民间海上商贸往来。^① 1771年西山起义爆发,西山朝统一安南,清廷承认西山朝阮光平“安南国王”的身份,1802年阮福映灭西山朝,清廷封其为“越南国王”,^② 均保持朝贡关系。对安南的陆路贸易自清初至鸦片战争期间,仅乾隆四十至五十四年(1775—1789)因西山起义短暂中止,^③ 其他时候均稳定持续。

清初对安南边贸并无口岸限止,雍正九年(1731)清廷曾议将广西边贸限于镇南关出入,但未严格执行。镇南关虽为朝贡正道,但系属关隘而无集市,故无边贸发展。雍正八年(1730)清廷定云南马白关为税口,系因自此有沿红河支流盘龙江而下至河内的商旅要道。同时,由开化府河口关沿红河至河内一线亦有传统商路,安南水尾州交河口的老街镇边贸极盛,使河口亦为事实上的贸易口岸。^④ 至乾隆时平而、水口、由村等处均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货出入口隘,其交易市场则位于安南境内的高凭镇牧马庸和谅山镇驱驴庸。^⑤ 乾隆四十年(1775)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将由村隘关闭,^⑥ 但五十四年(1789)仍复开放。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南又于谅山镇花山设立市场,以招徕由平而、水口两关出境的华商。^⑦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覆准:“赴安南贸易商民所置之货,由浔州、梧州两厂收税,龙州隘口免其征收。”^⑧ 由浔州、梧州地方官员负责税征,并与平而、水口等出境口隘构成完整管理体系。

3. 赴缅甸口岸

缅甸在清初因“永历入缅”而“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⑨ 乾隆三十一至三十四年(1766—1769)清缅发生战事,但除战争期间,中缅传统边贸始终持续。中缅贸易市场系位于缅境的蛮暮、新街、八莫、腊戍等地,^⑩ 商货主要由华商往来贩运。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廷定由云南永昌府、腾越厅、顺宁府地方官员“收税给照”,并在所经杉木笼、暮福、南河口三处查验,“内地商民贩货回关,并缅甸运货进关,即由杉木笼、暮福、南河口收税给照,运至腾越州、顺宁府查验”,^⑪ 使三府城与杉木笼等三关之间构成完整的对缅贸易的税征、稽查体系。因杉木笼等三税口去边境甚远,华商尚须经过铜壁、铁壁、天马等

① 参见(清)大汕:《海外纪事》,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页。

② (清)昆冈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02,《礼部·朝贡·敕封》。

③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44,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乙卯。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598、605页。

⑤ 平而、水口开关及牧马庸和驱驴庸二市设立时间不详,然乾隆九年广西巡抚即有奏报(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乙亥),其开关、设市应在此之前。

⑥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205页。

⑧ (清)昆冈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禁令》。

⑨ (清)彭崧毓撰:《缅述》,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

⑩ 参见(清)彭崧毓撰:《缅述》,第1页;《清高宗实录》卷808,乾隆三十三年四月; (清)马德新述、马安礼译:《朝觐途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9页。

⑪ 参见(清)昆冈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禁令》。

各边关口隘出入境。^①

4. 海路出境口岸

开海后南方四省商民可由海路出境,然口岸情形十分复杂。如广东即称“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口岸以虎门为最重……澳门次之。余如惠、潮,如肇、高、雷、廉、琼,各有港汊,亦各设口岸征榷”,其口岸“有正税之口,有之稽查之口,有挂号之口”,其中仅正税之口即“三十有一”,^②闽省同样是“海关税口并巡查小口共六十余处”,^③正口税关下复各设若干“验放”和“稽查”口岸。江海关初设24处口岸,雍正七年(1729)调整为18处,浙海关则有宁波、定海、嘉兴等7大口之设。^④因货源组织情形不一,理论上各“总口”、“小口”均有可能成为民船出海口岸。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的沿革特征及其成因

清前期外贸口岸体系的发展沿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与清朝贡体制的构建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亦即与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和边疆绥服进程相一致:其一系自清兵入关至康熙中期,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及二十八年(1689)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此为清海陆疆域初定、政权确立期;其二系康熙中期至乾隆中后期,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叛乱、三十四年(1769)清缅战事结束、五十七年(1792)清廓战事结束,清王朝稳固了西北、西南疆域,清廷对边疆控制加强并与周边邻国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经贸关系,此为清疆界全面确立、政权巩固时期;其三为乾隆中期以后,系为清统治的稳定发展时期。清外贸口岸体系及外贸政策的调整和演变与此进程相对应。

在政权确立期,清廷主要执行“海禁”政策。入关之初,因海陆疆界尚未肃清,尤其是在传统外贸兴盛的东南沿海地区统治并不稳定,清廷对外贸并无明确政策,既未干涉民商的海上贸易,其自身尚有组织官民商船出洋购铜之举。海禁后虽禁民商出海,但并未限制外商入境。加以清初除朝鲜外并无他国朝贡,清廷颇有招徕琉球、安南等传统藩国之举。^⑤至顺治九年(1653)暹罗题请“换给敕印勘合”,^⑥意味着其已弃明宗清。琉球于顺治十一年(1654)、安南于康熙五年(1666)分别缴印来朝,^⑦清廷构建传统朝贡体制的努力初见成果,此四国商人也渐次得以来华贸易。与此同时,在澳葡人于顺治四年(1647)清兵初入广州时即与清官员接洽,清廷亦复同意其继续在澳贸易,^⑧八年(1651)正式确认了明以

① 关于云南通关隘情形,参见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8页。

② (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5《口岸》,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九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15—216页。

③ (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86《海防》,华文书局1968年版。

④ 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第136—140页。

⑤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丁丑。

⑥ 《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二月戊午。

⑦ 参见(清)昆冈等纂:《大清会典》卷39,《礼部·主客清吏司》,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⑧ 《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八月丁丑。

来葡居澳门、相互通商的格局。^① 顺治四年西班牙借所属“小吕宋”之名来华,恢复了吕宋与厦门间的传统贸易。^② 十年(1653)荷兰商人曾赴广州,十三年(1656)清廷也正式同意其在广州贸易。^③ 此一时期意、英商船亦间有到穗者。^④

海陆疆界初定后,清廷很快开海,开放上海、宁波(含定海)、福州、厦门、广州(含澳门)等五口岸供外商出入,并开放原本厉禁的民商出海贸易活动。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五年(1717—1727)清廷虽曾有禁民商赴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之举,然总体而言对外贸活动干涉较少。在开海期间,雍正五年(1727)、乾隆十五年(1750)苏禄苏丹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两次遣使向清廷求援,清人称其“贡方物并求内附”;^⑤ 雍正九年(1731)“巴尔布来附”,乾隆十七年(1752)“布鲁克巴入贡”,^⑥ 各国也与清廷建立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至此,除日本、缅甸外,清廷与传统海陆藩属国的朝贡关系基本恢复。更重要的是,清统治者在按照朝贡体制构建国际关系的同时,将来华各国区分为“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⑦ 即将无意甘居藩属的西方各国以“互市”方式纳入朝贡体系。《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也使中俄得有150余年的和平贸易。

乾隆中后期清疆域全面确立,外贸也进入朝贡贸易体制成型、管制加强的阶段。1759年浩罕向清廷请贡后,清廷定其贸易口岸、税则;1787年缅王孟云遣使入贡,1790年清廷因缅人“求开腾越关禁”^⑧ 而重开边贸并定口岸制度;1792年廓尔喀请贡后,驻藏大臣也开始主理西藏边贸。至此,清廷循朝贡体制与西北、西南邻国也建立了稳定的经贸关系,并开始在上述地区的外贸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清前期外贸口岸体系的发展沿革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其一,鸦片战争前清廷主要根据疆域控制及与各国朝贡关系的确立依次开放海陆口岸。就数量而言,乾隆中期前随着朝贡体制涵盖范围的扩大,外贸口岸也不断增加。除京师外,海禁时期清廷仅开放广州(含澳门)等3沿海口岸及对朝贸易的盛京等3陆路口岸,总计有6处准外商入境;开海后准外商入境的沿海口岸增为5处,陆路增开齐齐哈尔等6处,出入境口岸达14处,此外尚有数量无法统计的海路出境口岸;乾隆中期后增开喀什噶尔等7处,不计无统计的西藏各城及出海口岸,出入境口岸增至18处。

其二,随着朝贡体制的完备,乾隆中期后清外贸口岸体系也渐趋成型。清廷所开放的不同口岸各司其职,各有相应管理机构且针对不同贸易对象国而执行不同的税收政策。此外,随着各口岸职能明确,此后清廷再未增辟通商口岸且有所收束。如将对俄边贸限于恰克图一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第1册,第100—102页。

② 参见(清)周凯、凌翰等修纂:《厦门志》卷8《番市略·吕宋》,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7—8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七月戊申。

④ 参见(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24、33页;[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9页。

⑤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62页。

⑥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82、96页。

⑦ (清)嵇璜、刘墉等纂:《清朝通典》卷97《边防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729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1325,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地,对缅甸、安南贸易也由初无限制而转变为明定口岸。因此1757年对西人实施一口通商,系为外贸管理经制化而非外贸政策转向“保守”的结果。

其三,乾隆中期以后,清廷对各口外贸的管理也显著加强。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对中亚、四十四年(1779)对朝鲜、五十五年(1790)对缅甸、五十七年(1792)对越南的外贸管理均有经制化的谕旨。乾隆五十七年前清廷未涉足对在藏外商的管理,而是由达赖喇嘛派员监管,此后则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事。即就广州而言,粤海关监督控制力的强化也同样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①

其四,乾隆中期后各口岸外贸管理的政策也渐具一致性,尤其是对内外商人人身管控的加强。除广东于乾隆二十四年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外,五十五年对赴缅甸、安南商人也有印票查验之制,^②五十七年对在藏外商有造册给照和设卡查验的制度。^③福康安甚至有在藏地仿广州十三行由行商管理外商制度的尝试,仅因“藏中贸易俱由巴勒布商伙自行贩货零卖,唐古特又无开行承揽之人,无从代为经理”^④而罢。

三、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清前期通商口岸的地理分布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除与朝贡活动密切相关的京师外,上列陆路口岸均在边地,沿海口岸亦均在长江口以南。^⑤清统治者置口岸于边疆,反映出其外贸政策的本质仍系以边市羁縻外夷的封建传统政策。尤其是对中外商人人身控制的加强,更系出于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原因。广州口岸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既足敷外贸需求,又置外夷于远地,近在咫尺的澳门复为夷人提供非贸易季的居所,从而减少民夷杂处的机会,对于清统治者来说实为不二选择,这是清廷实施一口通商最为重要的原因。

其二,清廷所开各口岸均有特定贸易对象国,如陆路各口岸均针对相应邻国,沿海口岸情形虽稍为复杂,但亦各有专司。清廷对各国开放口岸的密度及外贸政策待遇有显著不同,如对朝鲜、安南先后开放口岸均达4处,各沿海口岸复均对琉球、暹罗商船开放,对上述四国贸易关系也相对持久、稳定;对俄罗斯、缅甸口岸的正式开放则均在战事结束、双方疆界和政治关系稳定之后,口岸管制也更加严密;对西方各互市国初为五口岸,后为一口通商。亲疏有别的贸易待遇显与各国同清廷朝贡关系的密切程度相关。

其三,清廷对各国开放口岸所具商货集散、税务稽征及出入境管理等功能各不相同。如沿海口岸大多既是商品集散地和交易市场,也是税务稽征地和出入境口岸,而陆路除中江、恰克图及河口外,其他外贸商货的集散地和税征场所均设在深入境内的相关府城,如喀什噶尔、永昌、潯州等城俱在腹里,而沿边相应的杉木笼、平而等口则设有税关或出入境稽查的

①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14,嘉庆十四年六月乙巳。

②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禁令》。

③ 参见佚名:《卫藏通志》卷11《贸易》,第1—5页。

④ 佚名:《卫藏通志》卷11《贸易》,第1页下。

⑤ 孙文指出清前期有商船自山东诸城等港私赴长崎事(参见孙文:《〈华夷变态〉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4页),然此举显然并不合法。

口隘。此种情形是由于沿海及恰克图等口岸均系大城市或较大规模集市，本身均有繁荣商业及成熟的国内外商路，而新疆、西藏及滇、桂等省边境多属山地，沿边无大城市，并不具备实现上述功能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其四，清廷所开各口岸多系具备诸多传统外贸所需的自然和经济地理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各口岸虽被置于远地，但这些口岸或当中外交通的要冲，或具商业地理的区位优势而对国内外市场均有较强辐射力，其本身多系具有悠久外贸传统的商贸名城。除沿海各口岸早有发达的外贸航线外，陆路凤凰城、中江均扼中朝商路之要，对俄新辟各口岸的兴盛也与进京商路相关。又如“亮噶尔卡伦通巴达克山外夷，库库雅尔卡伦通克什米尔等外夷……乌鲁克卡伦为通各外夷及布鲁特要路”，^①然清廷并未将边市移至卡伦，而是置于商贾辐辏、贸易兴盛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此外，新疆、西藏外贸多赖外商，中缅、中越贸易则主要由华商控制，交易市场均在境外，而清廷能够区别对待，所开各口岸或准外商入境，或准清商出境，反映出清廷所建立的口岸体系虽受政治因素限制，但仍以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为基本条件，对外贸传统保持了相当的尊重。

四、结论

清前期外贸口岸体系的形成与朝贡体制的构建过程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清统治者执行了外贸商业利益服务于对外政治需求、以边市羁縻四夷的传统外贸政策。至乾隆中后期，清廷已构建成涵盖所有贸易对象国、功能各异的外贸口岸体系，所开通商各口岸，也均系顺应古代中外贸易发展规律、适应当时交通运输条件且具有外贸地理区位优势之所在。防范民夷“勾串”的政治因素虽有影响，但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条件在外贸口岸体系的塑造过程中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各口岸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传统外贸发展的需要。当然，19 世纪后，工业革命快速发展的巨大成果已需要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才能消化，而庞大的中国市场则给予西人极大期望。在此情势之下，清统治者仍抱残守缺，殊非应变之道，西人不断发出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①（清）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 75，第 8650—8651 页。